

纪念俄语教学前辈张西曼教授

李明滨 北京大学

张西曼先生(1895—1949)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业早已闻名。而他在俄语教学方面的活动,以前人们的了解则比较少,直到最近看到他所编著的两本俄文教科书,我对于这位俄语教育界可敬的前辈在我国俄语教育史上的地位,才有了更深的认识。

张著两本教科书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即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端,仿俄国人署名分三段(名·父名·姓)的惯例用俄文印成“西蒙·Б·张”,中间是横排俄中两种文字大字印刷的书名:Средний курс этимолог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中等俄文典》 下端为中文的“张西曼编”和“1923”两行字,为32开本,共238页。

另一本书的封面印刷对半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用俄文印出作者名“西蒙·Б·张”和书名(排成三行,一行大字,两行小字):НОВАЯ РОССИЯ Учеб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л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высших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下半部分用中文三行印出书名和作者名:大学适用之俄文读本 《新俄罗斯》 张西曼编著

下半部分的下端用三行(中俄文)较小的字体印有“北京 作者出版 1925”的字样,也是32开本,共192页。两本书均未注明出版社,看来都是作者自资印行的,足见条件之艰难和作者决心之大。从两本书末版权页印的广告看,当年在作者任教的两所大学,即中国大学和北京大学(第三院)内都可以购到,想必当时会是一番盛况的。但因为年代久远,目前国内的图书馆藏书已难于查找。这两

本书的原版,还是在不久以前经过俄国友人的帮助,才得以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珍藏中见到的,如今已是国内罕见的珍本,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中等俄文典》(1923)和《新俄罗斯》读本(1925),连同作者前此已出版的《俄文文法》(1921)三本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张西曼教授是我国俄语教育界最早推出系统完备的俄文教材的一位前辈,他在中国俄语教育史上开拓者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

中俄两国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后,通商互市、文化交流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时至本世纪初,两国互相学习对方语文的情况很不一样。对此,为张著《中等俄文典》作序的前驻海参崴总领事后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的邵筠农曾表示感慨,在序里说:“往者游学俄国,见彼邦之研习汉文者,于大学校则列为专科,更设专门学校以宏造,而文人学士,亦复苦心孤诣,出为著述,以饷后学;以故人才辈出,类皆足以符大彼得经营东方之遗谋,吁,可畏也!俄之于我,犹我之于俄,顾反观我国,习俄文者,则寥若晨星。何哉?”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情和社会背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俄语教学界本身即主观上的因素。

从国情来说,起初是清代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和腐败落后的观念;后来又有国人对于俄国的缺乏兴趣。即如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先进的

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不但学西方,而且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首先是客观条件缺乏动力。但是从俄语学界主现因素来说,也有俄语较难学和缺乏合适的教材,以及缺少得力的师资诸缘故。邵氏的序也指出了其中的几点:“考俄文出于古斯拉夫文,其文法之繁缛,远非英法德文之比;而英法德文,我国均已编译多书,俾学者得识门径,循序渐进,独俄文付诸阙如。以繁难之文字,而乏良善之教材,然则学者望而却步,相率视为畏途,亦何足怪哉!”

但是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客观情况大变,俄国已是革命先进的国家,成了我国万千志士关注和学习的目标。于是“治俄文,穷俄事”形成潮流。张著应运而生,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教材和工具,立即造成影响,岂不是非常自然的事!从现有不完全的资料看,张西曼教授的书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完备的俄文教材,比较完整的刘泽荣编《俄文文法》是在1936年才出现的。到了三、四十年代此类书籍就日见增多了。或者说,在编写俄语教材,配套成龙,形成系列方面,张先生是我国学界第一人。

其实我国开始俄文教学的时间并不晚,自从1708年清康熙皇帝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以来,至1862年该馆并入京师同文馆,已办有154年;从1863年京师同文馆设立俄文馆到1900年停办,又是近40年。从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俄文馆到二十年代初,又积累有20年。历来俄文毕业生不少,其中当是不乏优秀人才,但是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出现张西曼这样的人物呢?我想,要出现高质量的俄文教材和优秀的教学人才,至少要具有三方面的条件:通俄文(包括国情)、有志向(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己任)和具备教学经

验。而以往人士三者兼备的人则少见。在俄文教学开创时期,是以俄国来华的外交人员、商人或侨民为教员,后来增加了中国人,但无论教者或学者,多囿于“任官职、领薪俸”的习俗,缺乏大志;当然也会有志大才高者,但如果致志于翻译文学和政治书籍,引进新的社会思潮和新俄文化,而无志于教学者,则也不可强求于他们。唯有张西曼教授三者齐备,足以担当此任。

他从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不久即于1911年到海参崴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东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2年又到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这当中接触到俄国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曾创办了一所中学,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再次赴海参崴。正是这样,他不但精通俄文和俄国国情,了解其革命思潮和经验是中国当时所需要,而且认识到要“治俄文、穷俄事”,为此必须推广俄语教学,培养人才,因而把编出好教材引为己任。而他在二十年代先后促进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及其他学校的俄文教学,包括他自己在在中国大学等校教俄文已历数年,积累了经验。编书的条件自然成熟。即如他在《中等俄文典》的自序中所述:

一九一七年耸动全世界之十月大革命以还,国人对于俄国之政治、经济及文学诸方面始感生绝大兴趣,因而着手研究俄国文字以求直接的及彻底的研究吾邻邦上述诸方面之状况者亦日以众,顾学者恒矻矻穷年,终有堂奥莫窥之叹,是岂俄国文字之终难领会?特未得文法之善本以资启导耳。不佞从事于俄国文学之研究有年,搜集关于文法之各种主要材料以资研讨,尝欲编为专书,贡诸当世。……自十年(按民国十年,即1921年)春担任北京中国大学俄文讲座以来,益觉吾人研究俄文入手之良籍,极形缺

乏,而坊间所陈列者,除一二有其相当之价值外,率皆浅略滞晦,不可卒读……

张西曼出于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又以其俄文、俄国文化等方面的知识造诣和教学经验,编出的教科书自然有质量,非寻常人的教材可比。

《中等俄文典》就是一部完整的俄语语法书。它以讲授词法(书中作“字法”)为主,兼及语音(书中作“声韵学”);再以附录的形式列入“句法述要”和“标点法”两部分,讲解也颇为精当。这就构成了语音、词法、句法和标点符号这样完整的体系,也是至今俄语语法教学中仍基本可以沿用的体系。它虽系移植自俄邦,但也足以证明张著体系合符规范。词法部分也按词类划分的通例(书中作“品词”解)分为:名词、形容词、代名词、数词、动词、副词、前置词、连接词(书中作“连续词”)、感叹词九类(今日还应加“语气词”)逐项加以讲解,前五种词形有变化的词类讲解尤详,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体、式、位变化等更是重点。每讲一种语法现象,均配有适当的例句以资练习。课后还附有习题。还应当提到,书中所采用的已经是俄文文字改革后的新文字。即按1918年10月10日俄国国民教育委员会所颁布的《新缀字法令》,摒弃了旧的俄文字母。所以从全书来看,不但体系科学、内容准确规范,即使文字形式也能给人以新貌。若不是例句的中文翻译上由于时代所限,采用的仍是文言或半文半白的汉语(如:“君领钱乎?”“否,我领取信件。”“彼因何不偕君同来?”“君之女邻已偕其女来此。”等),则今天仍可以重印来参考使用的。

《新俄罗斯》是读本的性质,它兼有巩固语法知识技能和掌握俄文词汇提高读写能力之功用。一方面配合《中等俄文典》的语法项目(课文之前往往注明“见《文典》第几节”)进行练习,所以它的课文大多数不是选文,而是依据语法项目编的句子和短文。另一方面课

文本身又具有训练听说写读的功用,从词汇的注释(形、义兼注)课文的注解理解和技能的熟巧练习都有。

从读本的全书来看,内容新颖(反映了十月革命后新俄的现实和概念),即如本书作者在自序中所述,“近年来,吾国一般觉悟之青年……相率研究俄文以期树立国民外交之基础,承受吾老邻新主人翁之好意者,至深且切,第彷徨歧路,举足兴嗟,埋首经年,尤难有获,是合于吾人心理之良好教材之编著,实有刻不容缓者矣。”因而他所追求的是实用的合符新形势的教材。同时,作者也自述:“不佞竽滥大学俄文讲座已及五年,由日常经验中,对于吾国初学研究俄文之轻重缓急,已略有心得”,乃“收历年所讲授之俄文讲义加以相当之整理、修正及补充,印刷成书以应社会之需要。”因而该书的实用价值自不待言。实际上它也符合教学法循序渐进的原则。60课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头20课课文由句、段渐增至文(约为一页),中间20课逐渐增至一页半;后20课则已是2页、2页半不等了。课文难度也是由浅入深。课后附有大量练习,符合“精简多练”的原则。诚如作者所说,读完该二书之后,当可掌握初、中级俄文,准备向高级过渡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后所附的广告预示:即将推出新书九种,如《俄汉新字典》、《原文中等俄文典》(供高级班用)、《俄国短篇名家文选》、《俄国革命运动史》、《俄国文学史》、《俄国史》、《中俄交涉史》等,这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学术视野宽广、造诣高、有雄心的专家。不要说在先行者当中,即使在后学辈里,能达到如此高度者,我想,恐怕也不会是很多的。无怪乎每每见到他的同辈和学生所写的回忆录,都对他表示深挚的景仰。

上面所述,只是我的初浅认识,管中窥豹,难见一斑,谨以此纪念张西曼教授诞辰一百周年。